

王家范 著

SHIJIA
YU
SHIXUE

史家与史学

本书回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，探寻吕思勉、许思园、范文澜、张荫麟、萧一山、柳诒徵等最有成就与影响的史学大家的学术追求与人格魅力，同情地理解、分析特殊历史境遇中的思想遭遇与人生遭遇，并从整体上对20世纪中国史学做出自己的考量。新见迭出，多发人所未发。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SHI JIA
YU
SHI XUE

史家与史学

王家范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家与史学/王家范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7. 5

ISBN 978 - 7 - 5633 - 6509 - 8

I. 史… II. 王… III. ①史学家—思想评论—中国②史
学—研究—中国—20 世纪 IV. K825.81 K092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336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55395790 - 103/168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 × 1 300mm 1/32

印张:8.5 字数:210 千字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 ~ 6 000 定价: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电话:0539—2925659

自序

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鼓励与支持,我把近十年来写的文章,凡有关“史家与史学”主题的,汇集为一册。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回望上
世纪史学前贤,作点百年学术史的梳理。它们原是为了教学的需要,
也是给自己补课,借以汲取治学养料,故无甚创见可言。先天不足,
后天失调,是我这一辈学人比较普遍的命运。幸运的是历史走向形
似螺旋,转过一个弯道,又给了我们得以梦回学术盛世,亲近前贤命
脉的机会。虽然遭逢了隔绝断裂之厄,补课是来得晚了些,毕竟还算
赶上了,没世而不憾。希望年轻的学人能够从我身上体会到学术
发展路径方面的困苦和曲折,珍惜现在开放的时代条件。

也许到了老年,锋芒消钝,终于甘心地坦承:一代人有一代人的
命运,这是无可如何的。过去许多时候,我们不是存心不作为,而是
无法有为,像梁启超说的“过渡中人”,两头不着岸。既然生于出不了
学术大师的年代,与其怨天尤人,何不平心地为过去的大师与将来出
的大师之间做一点铺路、架桥的基础工作?我相信,如果能够真诚地
在守先待后方面作出努力,我们的后代就不会因为我们是过渡性人
物而鄙视我们。因此,我常常想,我们的不足和缺陷,不是我们个人
的耻辱,相反可以成为我们所教学生的财富——从我们诚挚的检讨
里得到领悟,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变成改善自己素养的资源,他们一定
能够大大超越我们,直至走出没有大师的那种历史困窘。

年轻是一种无价的资本,一生只有一次,稍纵即逝,永不再来。但我的年轻时代,“运动”多于读书,遗憾多于收获。或许读者不一定能充分理解我在文章里反复申述的,对前辈倡导“温情与敬意”,何以感受会特别的强烈。在我求学的年代,导师教育我们要无所畏惧,要张扬年轻人敢于破坏旧事物的那种势如破竹的锋芒。遗憾的是,这种锋芒,换来的不仅是自隔于历史传统,也滋长了年轻人因少知、无知而容易任性偏执。记得进大学不久,就遇到1958年“大跃进”,各行各业竞放“卫星”。班上讨论,同学为了积极响应,七嘴八舌,有的说三年超过郭沫若,有的说一年就可以超过陈寅恪。我是从乡下进城的下里巴人,见识少,比较幼稚。在高中阶段,承蒙同乡学长的无私寄赠,一直在读《文史哲》杂志。那时的山大历史系,曾是我梦中希望攀登的“泰山”,六大教授是向往拜师的“偶像”。唯因家里穷困,终究明智地改上了吃饭不要钱的华东师大(最近得知恢复师范大学待遇,我高兴得像是自己又进了一次师大)。也就因为《文史哲》的启蒙,多少知道一点天高地厚,当时竟连连摇头起来。谁知道这一摇头差点闯祸,挨了一顿“和风细雨”的批判,从此再不敢讽刺无所敬畏的“圣训”,也学会了夹紧尾巴做人。想起来怪可怜,那时我们根本就读不到寅恪老的原书。知道他,只是因为别人批判了他。华东师大也有值得自豪的史学元老,那就是吕思勉先生。然而他在我入学那年萧然离去,几乎就像大雁已经飞过,在师大的天空不留痕迹。直到70年代之末,我们才借严耕望的提醒,重新召回他的英灵,认识他的价值。诸如此类,不忍赘列。

本书介绍到的那些史学前贤和史学名著,我都是在70年代末才开始逐渐阅读到的。不说则已,一想及就无比的苦涩。中国古典的治学传统,一看重学家渊源,二讲究师承关系。到了新式教育的年代,书香门第出身,接续父辈学术薪火的,在比例上逐渐少起来,因此有无名师指点传承,显得特别的珍贵。在阅读学术前辈的经历时,我常常生出许多感慨,羡慕他们的先天条件,羡慕他们的从学环境。自

卑的情绪升上来,也会自怨自艾,两条都搭不上边,不成器也是天命。所幸穷苦的出身,也教会了我好强而不甘心彻底落伍。有名校出身,有名师手把手地教,当然是一种可遇而难求的天赐之福。但退而求其次,勤读名师著作,私心诚服于他们的教益,不也可以间接地接受师承传统?我甚至觉得,一个人的求学经历终究短暂。往事不可谏,来日犹可追。在一生更长的时段里,不断地读各种有益于提高自己学术素养的书籍,无问古今,不论中西,也是在努力延伸自己求师问学的谱系。这比起专守一家之学,或许更来得有兴味,更多扩展的意义。

很多年过去了,才逐渐明白,对历史的认识,和而不同是常态。反之,一定是万马齐喑,百花凋零。已经过去的20世纪,我认为,可怕的不是我们走了多少弯路,看错了多少问题,而是总有人喜欢发威逞能,居高临下,唯我独尊,用全盘否定前人来自扬自己的聪明。他们有一种反历史的恶癖,喜欢把烧饼从这一面烤到另一面,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,这样才感到痛快,才能显示出自己的高大。假若细细体验历史的微妙处,就像古贤所说的“有渐无顿”,历史时段越长,越容易理解一切发展都是连续中积累性的发展。所谓“大变特变”,无不包含着牺牲历史的代价。粗暴武断,绝对划一,永远是一切求真探索的死敌。可以感到欣慰的是,我们终于认识到:盘点好百年的家底,就是要抛弃一切狭隘的偏见,以同情理解的态度,尊重出于学术良知的一切歧见,合理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,把学术的发展看作是在百年探索不已、交相激荡中积累起来的共同财富,学术不属于少数人专有。许多同龄人都会有此共识,近20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确实有了进步。这种进步来之不易,理应具备加珍惜。

我在“补习”时所得的读书体会,现在尽情地袒露在大家面前,偏颇和失断在所难免。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心得一定对大家有帮助。但前辈身影失而复睹的历史情缘,我读时的特殊心境,作为一种过来人的经历,或许对年轻人珍重学术史会有些启发。仅此而已。

最后,我特别要感谢刚由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并从业于出版界的吴道如。作为一个年轻的责编,他的敬业精神和说服人的能力,使我非常感动。是他才使我有勇气把自己的文章再次显拙于诸君面前,准备接受各种批评。

2007年3月12日书于丽娃河畔

目 录

吕思勉:尽心平心治史的楷模	1
许思园:一个被湮没的现代学人	6
范文澜:追求神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	22
张荫麟与《中国史纲》	26
萧一山与《清代通史》	55
柳诒徵与《国史要义》	91
百年史学回顾之一: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	109
百年史学回顾之二:科学实证与人文诠释	127
百年史学回顾之三:中国通史著作编纂历程	146
小人物命运背后的大历史:史景迁《王氏之死》	181
解读历史的沉重:弗兰克《白银资本》	185
中国历史的重估:彭慕兰《大分流》	227
挑战与回应:《大分流》的“问题意识”	233
阅读历史:前现代、现代与后现代	249

吕思勉：尽心平心治史的楷模

我没有见到过吕思勉先生。我刚入大学的第二个月，先生便溘然病逝。长久以来，在我的头脑中，吕诚之先生是一位史学界的传奇人物。因为，听说他曾将《二十四史》读了三遍（据先生1941年自述，前四史读过四遍，《明史》两遍，其余为三遍。可见毕其一生，不止三遍之数）。说起来实在不敬，因种种的缘故，我真正对先生有点认识，还是近几年的事。古哲说“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”，至今思来真是悔愧交加。“大雁已经飞过，天空不留痕迹”，对个人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生命超越；对后人，特别是像我这样，作为华东师大他的专业后辈，却是不可宽恕的过失。今天，我们纪念他，研究他，庶几或可告慰先生于泉下。

入至近世，编著新式通史，吕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，业绩也最为丰厚。他不仅留下了两部通史，四部断代史实际也是先生计划中的大通史工程的一部分，惜乎天不假年，未能如愿，遂成学术史上的永久遗憾。先生自云，他是以“理乱兴亡”和“典章制度”两个板块构成他通史的大框架。两者相较，我觉得，先生在“典章制度”方面所留给我们的财富最堪珍贵。数十年来，真不知出版了多少部通史，不少如烟云飘过，就是有些颇负盛名的通史，在这方面也莫之能比，几乎可说至今尚无有超越者。这种成就得之非易，五十年遍读正史与十通，持之以恒，融会贯通，方可有如此系统而圆熟的心得。

先生的功力、学识固然令后人仰之弥高。在我看来,有些已不可及,例如,将来还有谁会将《二十四史》读过数遍?但是,我认为,先生治学的精神将是值得我们后辈永远记取的。

顾颉刚先生对《白话本中国史》所作的评论最为精当:“编著中国通史的,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,缺乏见解,其书无异为变相的《通鉴辑览》或《纲鉴易知录》之类,极为枯燥。及吕思勉先生出,有鉴于此,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,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。”此话已过去半个多世纪,读来仍震烁人心。通史编而不著,时至今日,仍屡有所见,其病根即在“缺乏见解”四个字上。

然而,要真有见解,又谈何容易?先生将他1933年的日记题名为《平监记》。这源自元代学者詹体仁的“尽心平心而已”。先生说:“予谓遇事弗克尽心,皆其心不能平,故平字已摄尽字之义也。”做学问心要平,心平则才能尽心。先生说的这层意思,很值得我们后学者琢磨。

明史界的朋友闲谈时就感慨过,现今搞明史的,有几人将《明实录》系统读过一通?更不用说难以数计的文集、逸史。多数都是应用时才去翻阅,“活学活用”。我自己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不能像前辈那样尽心?我自己知道,就是因为不能“平心”。吕诚之先生有一段话说到骨子里去了:“真正的学者,乃是社会的、国家的,乃至全人类的宝物,而亦即是其祥瑞。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,勉为真正的学者。如何可为真正的学者?绝去为名利之念而已。显以为名者,或阴以为利;即不然,而名亦就是一种利;所以简而言之,还只一个利字。不诚无物:种瓜不会得豆,种豆不会得瓜,自利,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。志在自利,就是志于非学,志于非学,而要成为学者,岂非种瓜而欲得豆,种豆而欲得瓜?不诚安得有物?然则学问欲求有成,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。”(《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》)史学界吃过“风派”的苦,大家都很厌恶。然而,“风派”亦随时代而进,适应时代的需要,形异而实似。其间天地之别就在“心平”与“心不平”几个字

上。心安方能理得。心平方可心安,方可入“意诚”的境界,即笃于真理的探索与追求,不为世俗的种种欲求所拘縻,独立思考,有自己学术上的执著。浮躁即缘于心不平。私欲太过,坠入世俗之孽障而不能自拔,举止言行自然必难不浮躁、不入俗。例如先生说自己一生思想有三次变化,第三次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。但是他与有些人不同,他的通史中就没有说中国有“奴隶制社会”;他不是不知道,别人就努力地去迎合过,而他因为与自己研究所得的不符合,也就不肯苟且,不说违心的话。这就是心平的缘故。先生说过他素不喜欢结交“名流之士”,但对真有学问的很是心仪。他做人也是如此的平实。

先生很不满“浮谈无根”的学风。他在1944年《论疑古考古释古》一文中说:“语曰:理事不违何也?曰:即事而求其所以然,是之谓理,事之外无理也……今之人往往通识未之具也,必不可不读之书,读之未尝遍也,而挟急功近名之心,汲汲于立说,说既立矣,则沾沾尔自喜。”专门家常看不起编通史、教通史的。其中有许多缘由,这里不必细说,所以也不能全怪别人有成见。但话还得说回来,真编好、讲好一部通史又是很难很难的。先生屡屡感叹“通人之难得”、“读书之人百,通者无一焉”,可见“通”是一种高度。钱穆先生把中国近世史学分述为三派,批评“革新派”急于求知识,而怠于问材料,“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,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。彼于史实,往往一无所知;彼之所谓系统,不啻为空中之楼阁。”(《国史大纲·引论》)钱先生其实是很看重历史的“系统知识”的,这在他把历史材料与历史知识相区分上就可以体会到。关键是系统的“历史知识”从何而得。这就离不开对史料系统的占有和精心的梳理。我觉得吕诚之先生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。厚积才能薄发,“必不可不读之书读之遍”,就是这种高度必经的阶梯。我最近反省自己,一度鼓吹“历史都是每个人心中的历史”甚力。在特定的意义上,这话并不错,问题是由此而轻忽史料的积累,不顾“即事而求理”这一基本道理,就把经念歪了。先立论,论点加举例,此种学风,在学生中有,学术界亦有,且有

渐成风气之忧。鉴于此,我觉得在我所教的范围内,误人子弟非浅,故近期在课堂上屡作检讨。例如,我们对专制主义之根深蒂固痛心疾首,由此很容易追根溯源到远古三代,好像我们这个民族就是禀赋这种先天的“遗传基因”而降生的。吕先生在《吕著中国通史·政体》一章中用了不少篇幅论证“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,在(中国)古书上,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”,并说“原始的制度,总是民主的。到后来,各方面的利害冲突既深;政治的性质亦益复杂;才变为少数人专断……有人说,中国自古就是专制,国人的政治能力,实在不及西人,固然抹杀史实。有人举此等民权遗迹以自豪,也是可以不必的。”近几年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贤的论著,似乎都有与先生互相契合者。当然这一问题还可以研究,但我总感到,前贤的论断是来自他们对中国历史的通感,值得后学者深思。撇开远古三代不说,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的源头在哪里?“君不君,臣不臣”,不就蕴含着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的,士大夫对君主行为不合“规范”的批评传统?这传统的根又在哪里?即使到了君主独裁的明代,也还不时有人敢于直谏、死谏君主的过失,就是像嘉靖、万历这样不成体统的皇帝,也不敢贸然冒犯这种传统,大多靠“知道了”一类捣糨糊混过。可见,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光“专制”二字即能了然的。没有系统的历史通感,便不容易看懂中国历史的曲曲折折,常犯简单化的毛病。多年通史教下来,我深感讲清民族历史的个性、复杂性是最难的,但它又是历史学探索最有魅力的地方。

我过去读吕先生的书,往往是把它看作有用的“卡片箱”,没有真正读进去。长期以来,一直误以为先生是一个搞纯学术、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。读了李永圻先生的《编年事辑》,才发现大错。先生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关切是很深的,他实际上是一个感情非常热烈而见解又十分通达的现代学者,能广纳各种新学说,圆融自如,不离本旨。当我读到他的《蔡子民论》,真是肃然起敬,谨录此以结束本文:

学术为国家社会兴盛的根源，此亦众所共知，无待更行申说，然要研究学术，却宜置致用于度外，而专一求其精深……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，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。因为变局的来临，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；即由环境急变，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，在目前则不复足用。此际若再粗心浮气，冥行摘涂，往往可以招致大祸。昔人于此，观念虽未精莹，亦未尝毫无感觉。所以时局愈艰难，人们研究的问题，反愈接近于根本……中国近代，需要纯科学甚亟，中国近代学者的精神，其去纯科学反愈远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看似无关实际，其实此为整个民族趋向转变的一个大关键。

（刊于《东方文化》1998年第5期）

许思园：一个被湮没的现代学人

许思园先生，我无缘得亲睹其神姿风采。初次知道大名，距先贤悄然离世已六载。其时因与学中君有师生忘年之谊，得以拜识他的姨母，先生夫人唐郁南。郁南前辈出诸湖南浏阳唐氏，著名近代政治家唐才常季弟之女，体态清癯，瞳子炯然有神，举止风度翩翩然名门闺秀风范。数度晤谈，获悉先生在巴黎的一二经历，而印象最深的是先生与爱因斯坦大师的驳议“相对论”，因感到神奇莫测，没有敢多加追问。先生的一部分遗稿，学中君携来亦曾匆匆读过。那时我对先生满溢诗情的飞扬文采简直倾倒，先生以睿智卓见所传达的意蕴，却因着文化浩劫尚带“余温”（此非温情之“温”，而乃“左热”之逐渐降温，余毒未尽）于身，竟无甚体会，读过也就置之一旁。回想起来，当时与先生真是限隔着一个“历史空间”，前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，在受到极“左”文化熏染的吾辈，恍若陌路。这次，有幸读到先生知交周辅成先生写下的悼语：

人总是要死的。死，当然并不一定是不幸的事，也并不一定是可悲的事。然而，如果一个人的死，并列在很多不幸者中，而人们都在为一切不幸者的不幸而悲痛的时候，他却像被人忘掉一样，甚至无人想到、念到，好似山谷中的鲜花，自开自谢，无人过问，这就使人不能不无限低徊了。

字字句句仿佛就像是在谴责我，或者像我一样的文化愚昧者，面对这样深情地关切着民族的命运与未来的那份心思，如此木然而无动于心。现今，为着先生遗稿的出版数度北上几乎耗尽最后心力的郁南前辈，在病床上已一无所知。她无言的心中怕仍系念着遗稿，却尚不知苦心已证正果。这是何等的悲哀，又是何等的凄痛！

我受先生遗属之托为《思园文存》（正式出版题名为《中西文化回眸》，华东师大出版社版）书后作跋，作为后学晚辈本不敢承当。然而，一则为了着忏悔我当年的愧对先贤，如同赎罪；一则也因为自己年岁遭际的接近，渐渐的竟与前贤的心思有了几分沟通，对先生的沉潜玄机或许能体悟一二，也想藉此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：肉身固然必不可免地都要化为虚无，而一切美好的追求，有价值的思想，毕竟会超越时空和世间业障而获得永恒，随缘感通着凡有良知（或良知醒起）的生灵。诚如先生赞陶（渊明）所谓：“其人虽已没而千载有余情者也。”

先生出身诗书世家，自幼聪颖，耳提面命之年，即浸染于国故艺文格致之学，续承我中华命脉的文化基因植根殊深，故一生学问虽变易累进，却初志不改。随时代风云际会之变化，先生在大学时代习练西语、通贯西学，用力维艰，成绩卓然，已经显示出他后来兼学融通、孤往独来的精神气度。年仅 21 岁，即用英文写成第一部学术专著 *On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*（《人性与人的使命》）。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极赞其哲学睿智之余，还称誉其英文比自己写得好，于此亦可窥见先生西语之精美圆熟不同凡响。而后游学巴黎、卜居普林斯敦，寓居西土十又二载，在西方世界从容应对于人文、自然诸高深学问，游刃有余。在常人看来，他应该是一位已十足西化了的学者。令今人，特别像吾辈晚生，最惊讶莫解的是，先生对我中华传统文化之挚情炽爱，有时竟表现得犹如孩提般的天真，比之习居故土而未离半步的“土著”还意诚无染。这使我不由得不信，悠悠数千载的中华文

化内核确实具有深远而根固的生命力,足可穿透一切,圆融天地而真如永在,问题只在于你有没有这种悟性和感应融通的能力。

《文存》除第四、第五编系旧时所作,见刊于建国之前,多为自然科学与科学哲学专论,“中国哲学论”、“中国文化论”、“中国诗论”均著述于1956—1957年间,前后相续一年有余,正值先生走入“知天命”之年。十二篇宏文思缕一贯,精微绝伦,总计约不超出十万余字,谓之精品决不为过。然终至先生曲阜撒手西归(魂归于孔圣阙里,亦是天数),一直未获发表。当到晚生趋步走出先生当日之年岁,刚读出韵味欲寻究竟之日,已恨不能起先生于地下,而旧日与郁南前辈有多少晤谈的良机,却因无知而蹉跎时光,现今只能由文意寻绎先生之苦心孤诣,未知能否契合先生之真神胜韵,真的是悔恨惶恐交加。

得益于若干年前的“文化热”,方把我从倾心于政治、经济史,领向了对文化史关注一途。久之又不满“文化热”中时有的浮谈无根,近几年开始直接阅读20世纪诸文化大家的经典原作,真是豁然开朗,始觉今之学者实不乏拾取前贤余珠自重,旧案复翻亦不少见。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疾呼开设20世纪学术大家经典原著阅读课程,以正出入之由来,庶几或可免无谓之重复劳动。现读先生遗文,与梁(漱溟)、熊(十力)、冯(友兰)诸家参照,更觉同一应乎时代之潮流,继绝学,开新境,而亦各有独自的情韵,互不掩映。惜哉前述诸贤近年应因缘和合之会而终得名震遐迩,思园先生却仍孤寂无闻,无怪乎周老发此不幸之中不幸的感慨了。

思园先生以哲学为本,出入于文理两科,博闻多识,其精于数学、物理,恐在近世文史学者之中不为多见(恕我孤闻,唯知杨向奎先生实属此种奇才,且亦有与相对论驳议之作)。读毕《文存》,品味学识之兼通中西,文思之汪洋恣肆,已然饮醇似醉,然总觉此两端似尚不足证量先生人格学问之至微妙玄。尝多次寻思,先生何以在这当代史上“最不平常”(即“反右”斗争发生前后)的一年有余时段内,连续有“三论”之作,又何以不是“二论”而是“三论”?诸多意在言外,含

蓄内敛，凡过来人始能心领神会。令我敬佩的是，先生于患难中平生对文化的挚爱丝毫不减。反复往来诵读，始悟先生之文与质通贯三论，气息浑然一脉，活泼泼地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诗质意象，少有后来“学术论文”习见的呆板积滞之弊。哲学、文化诸论，意境深玄，然文体却极酣畅，让人领略到一种只有在陶、韦、李、杜绝妙好诗中才能享受到的，先生在诗论中再三唱叹的那种情致韵味：忽儿深厚高玄，忽儿萧散空灵，时或激越，时或低回。即使是比量中西、甄品短长的辨析，亦追求圆融无碍，力避偏执。我以为诗论最见先生真谛，实为前两论点睛之笔。就文致意趣而言，先生的传统诗人气质至为浓郁，故而若舍诗论而只读前两论，就难以于散文行运之深处，窥见正是最需要我们体悟的先生的诗人风骨，诗人情怀。毕竟是挚友知音，周辅成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文中则已道破机枢。周老说道：

许先生讲李白、讲杜甫如此精彩，如此神往，实际上作者显然是以杜甫、李白两种不同的性格，同是自己心灵的两面的表现，既矛盾，又调和……

窃以为先生之追慕太白，乃是风骨意远之所在；崇赞子美，则表现了先生亲亲而仁民的情怀，然究其心境之极致，爱太白则远甚于子美。不知周老能首肯晚学之妄评否？

自近代落伍、西学东渐以来，中国有识之士无不以中西文化比较为主旨，开始了对本土文化的重新认识。今人常以“认同危机”或“生存困境”抉发其题意，此为释义之需要，真实意蕴恐只有身临其境中人方能体其原味。漫漫长途上，论识之纷繁歧异几若万花筒，令人目眩，百年已尽，似仍未达其底止。偏执一端者，或扬西以抑中，或美中而丑西，皆随时势之变幻，浮游不定，至圣之境界乃如寅恪老所言，亦中亦西，不中不西，化机乃空灵无质，俱融于无形，真所谓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。思园先生是在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时期，孤往